

清末社会变局中杨度的前半生

刘晓洋

(石河子大学法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 832000)

摘要:国内对杨度的研究大多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些研究多涉及杨度后期的政治主张与思想转变,而对杨度前半生的理论研究较为缺乏。在本文中,笔者以杨度东渡日本前的经历为框架,将杨度的前半生划分为数个阶段,对其各阶段的经历从经济、政治、思想等角度辅以史料分析,以概述其在清末社会变局下的早期生活经历。

关键词:杨度;清末;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 K81

文献标识码: E

引言

19世纪的晚清社会,与以往的时代相比,毫无疑问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形式和文化观念只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变化(传统本身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传统一词是与近代相对而言,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概念),而未发生根本的改变。^①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来看,政治上,清廷的腐朽使得各地动荡不断,而西方列强的政治侵略又加速了清廷覆灭的脚步;经济上,太平天国运动过后,税收锐减,国库银粮空虚。而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正处于垄断资本主义转型的前期,加紧了对中国的资本掠夺和市场倾销,严重打击了中国传统农业和处于萌芽期的资本主义工业;思想上,各种学说的兴起使得知识分子内心充满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末社会的变迁随之而来。本文从早期杨度的生平经历出发,大致将其分为前期经学和接触新学两个阶段,四个部分。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分析与解读,在研究杨度早期生活经历及相关重要事件的同时,试图从中探析清末社会变迁的相关原因。

杨度生平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1年9月17日),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1875年1月10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生于湖南湘潭,1931年(民国二十年)9月17逝于上海。^②

一、杨度在经学阶段的快速成长

(一) 少时自立,福祸相依(0-14岁)

杨度出生于一小地主家庭。祖父杨礼堂曾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杨礼堂共有四子,其中二、三子早夭,长子杨瑞生因随父作战有功,后升任朝阳镇总兵,四

^① 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② 吴相湘:《旷代逸才——杨度》,丘桑主编:《民国奇才奇文:杨度卷·旷代逸才》,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1页。

子杨懿，即为杨度生父。杨度十岁丧父，后与其妹杨庄（叔姬）、三弟杨钧（重子）过继给其大伯杨瑞生。^①

杨度的这种经历在当时的社会并不少见。一是刚覆灭的太平天国运动沉重的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从民生方面来看，南方诸省死伤无数，仅从屠城角度考虑，清军和太平军的屠城杀人之举，皆不可计数。一方面，太平军对满洲人疯狂杀戮。如芜湖、九江一战，太平军在城破后，全城搜捕满族人，大肆屠杀“满洲城，杀戮再惨，男妇小孩，不留一人。”^②《清代兴亡史》中也曾有记载：“江宁旗民四万余，童子三千人，悉数被戮，无一留者，盖以为汉人复仇也。”^③另一方面，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也多有屠戮之举。“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④，“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⑤战乱不休使得南方各省人数骤减，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可以说是十室九空。从经济方面来看，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起义，前后开支军费4亿两白银，造成清王朝财政的严重危机。1850年时，国库存银800万两，而到了1864年，只有6万两。^⑥清廷赋税的大半都要依靠南方，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社会秩序依旧混乱，人口凋敝，田赋、关税、厘金和盐税这四大宗税收难以收缴，经济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这也可视为清朝覆灭的诱因之一。二是在鸦片战争后，列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各类条约，赔款使得国库空虚。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在《南京条约》中，清廷对英国的赔款还是使用多年贸易顺差所得的银元，而在后来的赔款中，却都转变为白银（银锭）。这种“钝刀割肉”式的持续赔款，使得清廷只能不断加征税赋，各类苛捐杂税，厘金、盐课、田赋等如同一座座大山，压在农民的身上，使得百姓生活难以为继。

杨度的幼年是不幸的，过早的失去了父亲，但同时，杨度也是幸运的，有一个能扶持门户的大伯使其不至于流离失所。同时这样的成长环境使得杨度自小独立，思想也自然与众不同。可谓是福祸相依。

（二）天赋过人，得遇名师（14-18岁）

“杨度从小天资很高，被乡人目为‘神童’。”^⑦少时杨度曾奉大伯杨瑞生之命，作了一首离别诗——《酬邓先生辅轮客汴返宁道中留别一首》，全文长百余句，一位名士在诗后批上：“慷慨

^①左玉河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13页。

^② 萧盛远（清）：《粤匪纪略》萧盛远从广西投入清军，后充江南大营统帅和春的机要幕僚，对于清军内情比较了解。

^③ 周远廉：《清朝兴亡史·第六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3月，第73页。

^④ 李榕（清）：《十三峰书屋全集》李榕，四川剑州人。咸丰二年翰林，散馆改礼部主事，九年入曾国藩幕，后历官湖北按察使、湖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同治八年（1869年）罢官归故里。

^⑤ 赵烈文（清）：《能静居日记》赵烈文字惠甫，自称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先后为曾国藩、曾国荃机要幕客。

^⑥ 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表2—73 咸丰朝银库历年结存银钱统计。

^⑦ 左玉河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13页。

爽激越，风格近苏，拜服拜服。”从此，杨度的文才就被传开了，名动一时。^①14岁，杨度在姜畲的老师张登寿被王闿运聘为家庭教师，杨度遂与张登寿一道前往王家。王闿运初读杨度文章便大为赞赏，从此杨度名列王闿运门墙，转入衡阳东洲石鼓书院开始学习。^②

王闿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世称湘绮先生，尤善“帝王之学”。王闿运爱惜人才，同时因材施教，培养出了如夏寿田、齐白石、杨锐、廖平等不同领域的大家，“出其门下者颇多，皆一时之俊秀也”。^③王闿运很早就中了举人，也可谓是少年得志。之后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但被咸丰朝的重臣肃顺看中，聘为塾师（实为幕僚），甚受礼遇，但肃顺在随后的“辛酉政变”中丢掉性命，而王闿运侥幸未被波及，但也只好成为闲散文人；后又成为曾国藩幕僚，但两人意见多有不和，很快就离去。有传言，王曾劝曾国藩“将军拥强兵、操重器，宜先除‘太平军’，然后整饬湘军，缀甲厉兵，伺机灭清兵，取天下而代之。”但被曾拒绝。^④年少得意，但却屡遭挫折，满腹学问却无所作为，但王闿运仍坚持着自己“帝王之学”的主张，并以此视角解释历史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变化。^⑤对于王闿运和杨度师生两人而言，有着相似的境遇，即才大志高却仕途受挫。^⑥这样相似的境遇使得王闿运对杨度格外看重，使其感到衣钵得以传承，并时常向杨度灌输古代策士们纵横捭阖的思想。而杨度的与众不同也令其青眼相加，曾言：“皙子，以你之才，日后大是有可为的，要好自为之。”^⑦最终将自己的学说倾囊相授给这位少年。^⑧

许多学者认为，杨度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拜王闿运为师，但《湘绮楼日记》中这样记载：“戊子正月癸丑朔，雪寒风冷……客无径人，唯杨郎依例来。”^⑨在《湘绮楼日记》中，“杨郎、杨侄、杨贤子、皙子”等词多次出现。这个“杨郎”应是指杨度。“戊子正月癸丑朔”即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说，杨度与王闿运相识应早于1888年，并经常前往王家求学，所以王闿运对其必然有长期的影响，这种重要的影响也持续到后来杨度的人生中。杨度

^①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4月，第8页。

^②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4月，第9页。

^③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7年版，第1页。

^④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4月，第10页。

^⑤ 在与儿媳庄的通信中，王闿运以历史参与者身份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作了分析，可反映其自我定位和认知：关于辛酉政变结果的解释，王闿运将自己拒绝肃顺邀请入幕看成是决定性的因素；又将曾国藩未能处理好“望海楼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曾国藩未能任用他为幕僚所致；对于中日甲午战争结局产生的原因，他归结为李鸿章未能听从其“取兵北洋，取饷上海”的建言；对于吴大澂兵败的原因，他认为是吴大澂未能请自己随同参谋所致。见周颂喜：《王闿运未刊手书册页》，《船山学刊》，2001年第2期。

^⑥ 童舜尧：《杨度政治思想探析》，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⑦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4月，第11页。

^⑧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4月，第9页。

^⑨ 王闿运（清）：《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文中“十三日，晴。……杨侄、陈伯敢来。”，“杨郎、贤子”等再次应证王闿运与杨度早已相识。

在王门下数年的时间中，不仅系统的学习了其经学思想（“杨度于经史子集常提出新奇解释，使素行通脱不羁的王也为之惊异”^①），还继承了其“帝王之术”的衣钵，希冀寻找潜在帝王，以辅佐其成大业（后来，杨度也的确选中袁世凯为其心目中的帝王）。这种背离传统宋明理学的心态深刻的影响了杨度，在《杨度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故宋学易以愚人，求用于史而不经，未有能知其大者也。”^②他认为宋明理学过分拘泥于史料，而缺少了经世致用的大局观。但在这一阶段，虽然西方入侵已过半个世纪之久，清政府在遭受一连串的武力屈辱后割地赔款，开放了大批通商口岸，但是照旧举行的科举制度主宰了当时的思想状况和价值取向。杨度在这段时期主要生活于内陆腹地，远离通商口岸，受外来思想影响较少，虽然他的思维极其活跃，但仍局限在传统的范围内。^③

在当时“西力东侵与西学传播所打下的烙印并不深，绝大多数读书人的思维和生活主要受以儒学为主导的价值体系规范着”^④绅士阶层仍是社会中的统治阶层，享有政治、经济、法律、生活等多方面的特权。^⑤下层知识分子想要提升社会地位，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唯一途径。据统计，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士子的平均年龄大概如下：生员 24 岁、举人 30 岁、进士 35。^⑥而绝大部分人在极低的录取率面前，终其一生也难以取得举人的功名。但杨度确实是才华横溢的，18 岁（1892 年）纳捐监生功名后，^⑦19 岁（1893 年）就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第 55 名，成为受人尊敬的“正统”举人，在不到 20 岁时就尝到科举制度给旧式知识分子带来的荣誉和地位。^⑧经学大师王闿运“纵横术”的教导，更使其养成了风流狂士的自信。吴相湘先生曾评价杨度“自视甚高、好独树一帜、不虚心”^⑨，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度与众不同的骄傲。杨度的长女杨云慧女士也曾说“父亲确是才思敏捷，遇事有独到的见解，意志坚强而很有些自负，所以，轻易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⑩杨度在考取举人后所处的绅士阶层，作为社会精英的主体，他们既固守着原有的传统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又成为社会上最早觉醒的知识分子群体，这种思想的变化是深刻而潜移默化的，先于当时整体的时代潮流，但还并未真正打破传统思想的桎梏。

从时代背景来看，可以这样说，晚清是一个混乱与变革的年代。竞争不断，各方势力在小小

^① 吴相湘：《旷代逸才——杨度》，丘桑主编：《民国奇才奇文：杨度卷·旷代逸才》，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 年 6 月，第 1 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87 页。

^③ 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第 9 页。

^④ 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第 31 页。

^⑤ 漆菲菲：《杨度的社团活动及其思想演变》，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第 7 页

^⑥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作用中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21 页。

^⑦ 吴相湘先生《旷代逸才——杨度》一文中，对杨参与乡试一事与本文有异，“1897 年秋，杨赴长沙参与乡试，得中。”

^⑧ 王志刚：《杨度第一次思想嬗变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 年第 3 期。

^⑨ 吴相湘：《旷代逸才——杨度》，丘桑主编：《民国奇才奇文：杨度卷·旷代逸才》，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 年 6 月，第 1 页。

^⑩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7 年 4 月，第 7 页。

的朝堂之上此消彼长，争斗不休。身体日渐虚弱的咸丰帝对朝廷的控制逐渐削弱，叶赫那拉氏后党暗中积蓄实力。咸丰帝驾崩后，各方势力蠢蠢欲动，一场“辛酉政变”即将拉开帷幕。倾向洋务的慈禧太后掌权，而较为保守的肃顺等人则被处以极刑。^①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太平天国运动后，清廷疲态尽显，已无力掌控局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的大片领土落入洋人之手，关税主权也成为洋人的囊中之物。李鸿章曾感慨道：“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②

二、时局的变动使得杨度的思想开始转变

（一）两试不第，接触新学（18-22岁）

在考中举人后，杨度并没有停下脚步，此时杨度是极其自负的“（杨度）中顺天乡试后，复从王湘绮先生游治《春秋》，闻大义，有揽辔澄清之志，惟高视阔步，有狂士风。”^③次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杨度与同门夏寿田一道，赴京参加甲午科会试，夏中探花而杨落第，考试不中。此次考试对杨度影响很深，他的骄傲自负也开始转变。在考场上，杨度看到学子们犹如囚犯一般，在“一排排像小鸽笼似的房间”考试，受那些爪牙们无端的侮辱，心里很不好过。^④考试结束后，杨度与夏寿田一道前往陶然亭赏景，杨度在墙壁上提下“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两句词，从此处便可以看出，杨度开始对清政府丧失希望，认为清政府已经出现日薄西山之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再赴京师，参加乙未科，仍落第。但在此期间，适逢“公车上书”，杨度便同任锡纯等湖南学子一道联名上书，并开始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联系，接触立宪思想。这种全新的思想使得杨度深受震撼，内心的震动也为他后来转向立宪思想埋下伏笔。

^⑤

还乡后，杨度继续在王闿运门下研学，但以《春秋》为主。在此期间，《杨度日记》中经常出现《春秋》、《史记》、《说文》、《初唐诗》等传统史籍。^⑥看似风平浪静，但其内心的苦闷却在其诗文中显露无疑。在《杨度日记》中有首无题诗：“……旷望千里昏，风浪动我情。远志厉所及，孤云郁相羊。濠梁访庄周，柱下咨伯阳。洪涛何足思，但恨川路长。湿雾弥远树，长重绕从冈。俯仰慕伊人，长啸迎风翔”。^⑦此诗杨度化用屈原的《九章》，“远志厉所及，孤云

^① 王志刚：《杨度第一次思想嬗变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3期。

^② 李鸿章：《复王壬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北京大学图书馆。

^③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4月，第13页。

^④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4月，第14页。

^⑤ 史学界许多学者认为，也是在此期间杨度开始与袁世凯相识，但在《袁世凯全集》、《杨度日记》等相关资料中，笔者并未找到相关信息，故不加评论。

^⑥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5—6页。

^⑦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0页。

郁相羊”、“俯仰慕伊人，长啸迎风翔”两句很好的体现出其此时远大的心胸和抑郁不得志之情，又寻访庄周、伯阳父等圣贤，最终希望得遇良机，迎风高翔。

“在历史潮流面前，聪明的人跟着走，愚笨的人被拖着走，清政府显然属于后者。”^①当时的各级官吏层层剥削，拿回扣、吃空饷甚至成为规章制度，八旗子弟们遛鸟、斗鸡，不学无术，凭借祖辈荫勋就能迈入朝堂，而普通的士子满腹才学，却只能面对八股文章悲愤苦郁。爪牙们作威作福，盘剥百姓，在这种现实中，许多爱国青年开始寻求新路，希冀改造国家。

（二）思想渐转，眼界开拓（22-28岁）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度曾前往长沙，在此期间，杨度参观了机器局、矿务局等新式企业，并购买了许多西方书籍“……与孙、盛至书肆，购得洋书数种”^②，杨度购买了哪些书籍，我们无从得知，但这些带有西方色彩的新鲜事物与书籍，开拓了杨度的眼界，进一步加深了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也在悄然间推动着杨度的思想转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杨度在长沙与时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梁卓如（梁启超）展开激烈论战。^③这次论辩主要关于时务学堂章程，还有《春秋》、《孟子》之争。这次论战的结果在杨度的日记中这样记载：“论辩甚多，词气壮厉，卓如初犹肆辩，后乃遁词。”^④杨度显然取得了胜利，他主张《春秋》应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故日《春秋》以治乱世，《孟子》以致太平。”^⑤认为《孟子》在太平盛世方有其价值，而《春秋》中所体现的纵横思想，在现在的乱世才真正能起到救国救民的作用。同时，对梁启超他也给出自己的评价：“然而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⑥虽然不认可他的学说，但是还是认为梁启超是年少有才之人。此后几年，杨度参加科举再次落第，开始将目光更多的转向时局。康长素、梁卓如等新派代表的名称频繁在其日记中出现，英吉利、法朗西等也屡见不鲜，“西学”一词更是时常提及。杨度也对时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1898年英军借口保护中国，将军舰开往大沽口时，杨度感叹道：“几于秦失其鹿。”^⑦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也曾说：“至于复冗员、闭言路、复时文，又不如新政矣。波澜反覆，是非皆无可言。”^⑧而且杨度也对西方各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曾作《日本传》，并研究西方信仰“耶苏”。^⑨

1900年前后，清政府迫于压力，不得已颁行“新政”，科举制度的改革也随之迅速发展，新式教育蓬勃兴起，留美、留日运动如火如荼。杨度也在此时，审察时局变化，毅然决定留学日本。在《湘绮楼日记》中，也能看到杨度思想的转变。在1901年-1902年之间，杨度多次前往

^① 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第18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41页。

^③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78页。

^④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78页。

^⑤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78页。

^⑥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78页。

^⑦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06页。

^⑧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10页。

^⑨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2页。

王闿运家讨论时事，“杨生来，遂谈一日；杨生来，遂同酌议……”等字眼也经常在王日记中出现。^①与此同时，师徒二人观点的分歧也越发明显。王曾在日记中写道：“（杨度）从我十年不及从程二载，何余之不能化人如此……乃为陈三立^②所移，父师不如交友之易染也。”^③杨度曾数次与王闿运商讨出国事宜，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杨度东渡日本前，王闿运仍不希望杨度前往日本他在日记中写道：“暂子来，言定出洋。余以当恤名止之，意殊不止。”^④但此时的杨度已经决定前往日本，寻求救国之路。杨度对时局的把握是准确的，在远赴日本后，杨度脱离了传统经学的束缚，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学新知，“思想为之大变”^⑤，并很快就与黄兴等人密切联系，成为引领时代的先进人物代表。

三、多重因素影响使得社会变迁

（一）政治彻底腐朽

为了统治中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控制中国政府，操纵中国的内政、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⑥60年代的辛酉政变后，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或被废，或处死，慈禧和恭亲王奕訢完全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西方列强的威逼利诱下，通过《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他们逐渐成为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代表人物流亡海外。慈禧所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大肆屠杀维新人士，刚有起色的变法就此戛然而止；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迅速发展，“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短短时间内，就形成一定规模；列强在政治上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并且不断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政治的相互妥协中，清廷对“拳民”们的态度多次转向，如同“太平天国运动”一样，义和团也最终成为黑暗政治的牺牲品。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随后的庚子国变让清廷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更是让普通百姓看清了清廷的腐朽无能。从最早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到后来的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系、淮系地主，列强不断在中国扶持代理人，使得内政外交完全落入洋人之手。在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彻底失去民心后，他们又发现了握有军权的袁世凯，在袁死后，又扶持皖系、奉系、直系等各系军阀，使得国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⑦

^① 王闿运（清）：《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光绪二十八年（1902）。

^② 陈三立（1853年10月23日—1937年9月14日），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陈三立出身名门世家，为晚清维新派名臣陈宝箴长子，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著名画家陈衡恪之父。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1898年戊戌政变后，与父亲陈宝箴一起被革职。

^③ 王闿运（清）：《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乙未朔六日。

^④ 王闿运（清）：《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辛酉朔十二日。

^⑤ 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第10页。

^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5页。

^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7页。

如杨度这类从小学习传统经学思想的小地主阶级，此时也逐渐认识到国家的孱弱，再未有所改变，真的就会国将不国。于是他们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杨度曾在日记中写道：“时士动称西学，辄谓朝廷不行，余以为官制、兵制、学校在朝廷耳，……立会则财聚而力大，西人良法，不妨效之，民不之信，亦非上所能强也。”^①对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也曾写道：“不知今日之事与甲午异，日本一国，而调度有方，我兵来一交锋而割地赔款，非战之咎也，未战之咎也。今诸国皆以中华为几上之肉，人争取之，力多而不合，心忌而不联，此如九节度之师，虽郭子仪无功也。”^②这种认识，不可谓不深刻。

（二）经济无能为力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方式，除了强迫中国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外，主要是利用其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进行掠夺和榨取，逐步把中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③

在《1840年-1849年的清朝财政》一文中曾记载，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4亿两，并仍以每年0.1亿的速度增长着。^④而到了二十世纪末期，清廷的每年的收入甚至还能抵消每年借款的利息。当时的清朝政府确实内外交困，但以慈禧为代表的统治者们仍贪图享乐，挥霍无度。经济上的举步维艰使其不得不向西方国家大量借债，而国库的空虚，民生的凋敝又使得税收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转型初期，为进一步扩大市场，他们开始对中国实行商品输出和资本倾销，中国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传统手工商业，在外国资本的挤压下一败涂地，百姓的生活更加民不聊生。

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从未停下脚步，短短几十年就已经控制了清朝的海关、邮政、盐税等财政要素。通过不平等条约，列强逐步控制各地的通商口岸，在巨大的政策优势下，如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逐渐成为列强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同时，在资本的巨大优势下，列强逐渐开始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且凭借各类不平等条约，在近代工业中很快形成了垄断地位。“1913年，外国资本占机械采煤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治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使中国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发展。”^⑤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不仅沉重打击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更使得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萌芽难以发展。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少数沿海的大城市逐渐走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内陆众多的乡村仍保留着传统的经济格局，这种巨大的撕裂使得阶级矛盾不断加深，为了改变这种无能为力的局面，早期的革命派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三）思想激烈变化

^①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44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第172页。

^③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7页。

^④ 周育民：《1840年-1849年的清朝财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⑤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29页。

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激荡的年代。自 1840 年甲午战争开始，“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就由曾经骄傲的“天朝上国”，转变为列强环伺的“东亚病夫”。如此巨大的落差，让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内心充满迷茫。社会的转变也让他们极其矛盾，“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①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他们一方面受到西方先进知识理论的冲击，同时又不可避免的被中国传统思想所束缚。激烈的思想文化交锋使得新的思潮不断涌现，洋务派、维新派、保皇派、革命派……在纷乱的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李鸿章、张之洞、梁启超、康有为、黄兴、孙中山、陈独秀等代表人物也大声疾呼着自己救国救民之道，传播着各方的思想。杨度就诞生在这样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同时也在那乱世中展现着自己的“旷代逸才”。他希望寻求良方，前往海外。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28 岁的杨度离开了他的祖国，毅然决然的前往一海之隔的日本，当他再次回国时，一切都有所不同。^②

四、结语

杨度的一生是传奇的，经历过世事坎坷和沉浮起落。在那个统治黑暗，列强欺辱，民不聊生的时代，在年轻的杨度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人的影子。既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孤高风骨，又有为国家找寻出路的一腔热血，同时又受到传统忠君报国思想的束缚，内心也有抑郁不得志之哀愁，满腹经纶却无法施展自己的“帝王之学”。这种复杂的心态是由内外部共同因素形成的，也反映了清末政治彻底腐朽、经济无能为力、思想激烈变化等社会现实的变化。“以人为鉴知得失，以史为鉴知兴替。”笔者认为，加强对杨度的早期研究有助于完整看待其思想变化的脉络，对近代清末社会的研究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① 左玉河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4 月，第 10 页。

^② 左玉河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4 月，第 569 页。

参考文献

- [1] 周远廉：《清朝兴亡史·第六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6 年 3 月，第 73 页。
- [2]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作用中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 [3] 王闿运（清）：《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 1997 年。
- [4]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 7 月。
- [5] 杨云慧：《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回忆我的父亲杨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7 年 4 月。
- [6] 李鸿章（清）：《复王壬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北京大学图书馆。
- [7] 漆菲菲：《杨度的社团活动及其思想演变》，温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年。
- [8] 童舜尧：《杨度政治思想探析》，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
- [9] 蔡礼强：《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 [10] 王志刚：《杨度第一次思想嬗变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 年第 3 期。
- [11] 周育民：《1840 年-1849 年的清朝财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 年第 2 期。
- [1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
- [13] 湖南大学杨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组编：《杨度研究论文选集》，湖南：湖南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 [14] 左玉河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杨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4 月。
- [15] 北京市档案馆编：《杨度日记（1896—1900）》，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 年 1 月。
- [16] 丘桑主编：《民国奇才奇文：杨度卷·旷代逸才》，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 年 6 月。

The first half of Yang Du's life in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ao-yang liu

(The Shihezi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Shihezi City, 832000)

Abstract: Most of the studies on Yang Du in China began in the late 1970s, and most of these studies involved the political proposition and ideological change in the later period, while there is a lack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first half of Yang Du's lif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akes the experience of Yang Du's journey to Japan as the framework, divides the first half of Yang Du's life into several stages, and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materials, to summarize his early life experience under the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Yang Du; late Qing Dynasty; social change